

## 投入母校的懷抱—知用與我的甲午情緣



今年（2014）是馬年，歲次甲午，一百廿年前（光緒廿年，1894）的甲午七月，滿清朝廷爲了朝鮮爭端與日本衝突，爆發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甲午戰爭」。結果是繼「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之後，屢戰屢敗的滿清朝廷又一次在國際舞臺上受盡了屈辱。甲午戰敗，清廷與日本於翌年簽訂了割地（臺灣、澎湖、遼東半島）賠款（白銀三萬萬兩）、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當年清廷代表是李鴻章，日本代表是時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此人半生叱咤風雲、霸氣冲天（日後於 1906 年在中國哈爾濱車站爲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刺殺身亡），也有才學。議和期間在宴會上，伊藤氏口占一聯曰：「內無相，外無將，不得已玉帛相將」，要李鴻章屬對。那擺明是諷刺中國及其大臣。李鴻章對不出來，回去告訴參隨，卻都無語以對。有個浙江人學問很好，但一向不爲李所重，他慨然說：「那不難，可以這樣對之：『天難度，地難量，這纔是帝王度量』」。這個下聯果然「將」得好。李鴻章才情雖然大不如人，氣節還是有的。野史上說，他在《馬關條約》簽署後使俄，途經日本要換船，日本爲其供張行館，李不就，且以舢板之爲日本舟也，亦不乘；今於兩舟間架飛樑才跨過去搭新船。

「甲午戰爭」爆發兩個多月後的九月廿二日，在湖南省資興縣的一個唐姓家庭裡誕下了一個男嬰，四十五年後（民國廿八年，1939）這位正值英年的湖南漢子在遙遠的中南半島上之越南堤岸創立了一所學校，他就是我們母校—越南知用中學—的創辦人唐故校長富言先生。接下來的一個甲午年（1954）的五月間，在中南半島亦發生了一場名聞中外的戰役，那就是「奠邊府之役」。是役法國軍隊大敗，結果之一就是當年交戰雙方簽訂了《日內

瓦協定》，直接導致了數十萬華人由北越移居南越，其中很多文教界人士後來成爲了知用中學的老師和僑教界的中堅，眾多南撤家庭的子弟們也都成爲了該校的學生。咱們家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兄弟姐妹四人都和“知用中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大姐思麗與大哥思良同是高中十七屆，二姐思明是高中廿四屆，不才在下則是卅三屆，出生於甲午馬年的我雖然最晚報到，但卻是結緣最久者，前後共長達十一年（1961～1972）。座落於堤岸阮維揚街 83 號安東市場西側的母校，當年新建校舍大門上方矗立著「知用中學」四個大字，右側上款赫然是「甲午冬」三個小字，左側下款則是「園丁」（註：唐故校長字“仰勳”，號“南楚園丁”），這怎能不說是冥冥中自有安排呢？

我的家就在“知用中學”正對面（阮維揚街 68 號），而我卻是在民國五十年（1961）暑期過後才插班小學二年級進入母校就讀的，大家一定很好奇，爲什麼是‘插班’而不是一開始就選擇了母校，之前又是在那兒上學呢？這說來話長，來到“知用”之前，我是在同樣位於阮維揚街上另一所名叫“三育小學”的教會學校裡度過了幼稚園和小學一年級的三年時光，在升上二年級後的某一天，早上起來要去上學時卻接到學校通知：「沒課可上，學校要關門大吉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背後卻蘊藏了多少當年在越華人子弟們求學的辛酸，且讓在下慢慢道來。

當年越南政府忌憚華人的影響力，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層面上採取了一系列的排華政策，想盡方法來控管華人。於 1950 年代末實施國籍法，強迫華人入籍，切割華人與母國的紐帶，如不願入籍者則所有行業及工作不開放予華人，並取消其外僑居留權，勒令離境（家裡大姐與大哥就是在此情況下以撤僑身份赴台升學），規定華商招牌廣告上越文面積須大於中文，家家戶戶須於正廳懸掛總統肖像。

在教育方面設下層層障礙，首先訂下華校教學以越文爲主，限制中文授課的時數，且不定期地派遣所謂的‘督學大人’到各華校巡查，規定教室須依一定之格式來佈置；吾人當然是給他來個陽奉陰違啦！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尤記得當年課堂上置於黑板旁的課程時間表是中越兩面，平時以中文一面展示，遇有突發狀況即臨時翻轉背面以越文示人，同學們的書包裡隨時準備著相應的越文課本。每當‘大人’到訪，大門口會客室的校役‘羅伯’即借故拖延以爭取足夠的時間通知校內各年級的授課老師及時應變。

接下來在中越學制轉換上大做文章，出‘茅招’：本來，在學制方面中越二者皆採小學和中學合共十二年的制度，區別是華制乃中小學各六年，而越制則是中學七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和小學五年；越南當局主事者即在此處使出卑劣的手段，硬性規定二者小學畢業爲同等學歷，如此一來結果就是華校高中畢業只能相當於越制的 Đệ Nhị (Lóp11)，平白損失了一年光陰；此舉對女同學影響尙屬有限，但對男同學則直接關係到他們日後切身的兵役問題。

最後，爲了充分達到壓縮華人學習中文的空間，更使出一招殺手鐮，那就是訂立華校校長人選的資格，規定每間華校需要由一位通過政府核定資格的人士來擔任立案校長（通常是受過越南師範教育培養者）。當年“三育小學”隸屬“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校長是一位陳姓的牧師，據說是自南洋新加坡地區借調來越的，並不具備越南政府所訂之資格，學校一時又找不到適合的人選，結果當然就是‘關門歇業了’！在下也就初嚐‘失學’的滋味，然而不到廿四個小時，第二天一覺醒來，家人就替我在家門口正對面徒步不用一分鐘即可抵達的“知用中學”找到了日後長達十一年的歸宿，亦同時開展了我生命中接著下來四千個如沐春風的日子。

說到這兒順便一提，本校於 1960 年代初（1964 年之前？）在政府立案註冊只到越制初中，亦即相當於華制的高一，所以高二與高三兩個年級的同學不得不‘移玉’到我們的姐妹校（“啓智英文高級中學”）以“補 B”和“補 A”的名義‘借讀’，我想很多本校廿五（？）屆以前的同學應該都有過這段刻骨銘心的‘遊學經歷’（自安東街市遊到六叉路）。二姐思明即是其中之一，我所認識的校友中如林雨華、吳越珍、李石光、何源開……好像都同屬“補”字派人物。

自母校高中畢業後唸了一年的越制高三，即負笈臺灣繼續深造並於 1980 年代未來美，屈指算來不才在下在美利堅的時間乃是在越、台、美三地中逗留最長久的了，照目前流行的說法，只能自稱「美籍華人」，但是慚愧得很，從下意識到顯意識，我至今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雖然學的是理工科，但對中國文化裏的文、史、哲卻有著濃厚的興趣。後來逐漸明白到，原來「中國人」自始即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而我的「文化認同」始終是華夏中國，不是西方，雖然我對西方文化中優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賞。這或許就是所謂的「中國情懷」，使我能夠欣賞《詩經》、《楚詞》、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略知儒、道、佛各家思想和宋明理學。此情懷古已有之：在李陵〈答蘇武書〉中之「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即已道出此中癥結。身處異邦，閉關自守的民族主義不可取，崇洋媚外的態度亦不可取，排他仇外的情緒更不可取。但是基於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認同而產生的自信心及凝聚力卻是健康的和必要的。

吾生也晚，未能攜卷挾冊親灸受誨於唐故校長尊前，然而毫無疑問地，學生心中那股「中國情懷」的種籽早已在南楚園丁手創的知用校園裏埋下，並在日後各級師長無私辛勤灌溉中成長、茁壯。

感恩之情無以爲報，謹藉今年南加州知用校友會校刊專題紀念唐故校長一百廿歲冥壽之便，特撰本文聊表學生寸心於萬一。

永遠的知用人—龍思聰 (TD-12813)

脫稿於民國壹百零叁年十月廿五日

歲次甲午閏九月初二夜

花旗國南加州愛滿地朗冰園



沒註冊，「偷渡」進入知用校園和幼稚園觀光遊覽



初中時 (1967 年 11 月) 與 拍高中畢業團體照當天 (1972 年 3 月底)

先父攝於校園中

與同窗郭沛成、陳玉芝、江均生

留影於禮堂與原教務處入口前



高中畢業典禮當天接受傅校長頒獎